王安石改革智慧的当代启示

□李锡炎

纵观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始末，深感他一方面忧国忧民，勇于任事，敢于创新，有强烈的改革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的确，他具有推进改革的高超领导智慧，是一位智商、情商、财商俱高的改革家。他推进改革的领导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对于当代全面深化改革颇有启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以择术为始”，从改革创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创新学理、政理、事理做起，打破思想桎梏，选择和确立体用合一、经世务实的新经术为改革变法的指导思想。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2月，48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自此正式参与政事，成为变法改革的主持人。据《长编拾补》记载，王安石与宋神宗论治国之道，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当以尧舜为法。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行先王之道。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对神宗明确地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空洞无用的经术，而是与世务贯通的体用合一的实学，是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的新经术。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变法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改革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他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以择术为始”的思想理论准备。面对重重压力，王安石一靠谋略，二靠勇气，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战，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经术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奠定变法的理论基础，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证。

其次，改革方案深思熟虑，全面配套，从改革科举、培养人才入手，着力于理财治军、富国强兵，先易后难，步步深入。

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财政收支不平抵，国库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洗不清的屈辱，同时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宋代的这种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造成入不敷出。军队数量庞大，但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王安石认为，要解决兵多而弱、财富而贫这两大严重问题，必须变法革新。

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治国方略和改革措施，于公元1059年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进献朝廷。他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而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锢，人才缺乏；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员廉耻日毁，贪污盛行；再加上风俗大坏，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道。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开源与开放的理财之道，择将治军的强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专以经术取士的科举改革、实施青苗法的经济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用现在的话来说，既深思熟虑地进行顶层设计，又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推进改革。

再次，选择“变风俗，立法度”为改革突破口，确立“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运用法治的力量推进改革。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欲达此目标，变法改革如何起步，从何处入手呢？王安石明确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风俗不变则新法不能久行，所以变风俗作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经世之术取代空泛陈腐的儒术，排除变法革新的思想障碍。但是变风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说新学，只有把新思想新经术转变为制度法令，才能改变社会风气。王安石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变风俗则法度不立，不立法度则风俗不变，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长处，又继承了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采用了“常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所谓“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就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和标准来制定法令制度，绝不是按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而设立。只有以中人为制，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贯彻执行法令制度，只有易知，才会易行有效。王安石这些决策思想至今仍然适用。

最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握抑制兼并的合理尺度，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减少改革风险。

王安石从公元1059年进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表达改革方案，到公元1069年开始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长达10年之久。在宋英宗期间，皇帝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屡召不出，他乐天知命，不慕富贵。他深知，时机未到，妄求进取难有作为。公元1067年4月，20岁的宋神宗赵顼登基，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人品才学，是一位心思变革的有为之君。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认为改革变法的时机成熟，就此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

王安石出于推行经济改革，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坚决反对垄断，极力主张抑制兼并，但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却非常冷静，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户的田产分给贫民，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增加改革的风险。

公元1074年4月，在改革变法取得明显成效之时，宋神宗认为是他“自奋英断”之日，一手导演出罢相的闹剧，逼王安石下台。王安石毫无野心，不争功，不争锋，主动请辞。吕惠卿接替王安石任参政知事之后，野心暴露，屡起大狱，打击改革派。神宗又于公元1075年2月召王安石复职，此时再兴改革，已举步维艰，不足二年他便离任了。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表现出一种出入自在、行藏自如的境界和风骨。

王安石变法革新，从指导思想到目标方针，从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骤，都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史 镜

得相能开国 长策归一统

□秦毅民

几年前，朋友向我推荐《大秦帝国》。我一看六部十一本煌煌数百万言，即望而却步。今年来中央党校学习，适逢中央电视台播放《大秦帝国之纵横》，不经意间看了二集，感觉不错，正好朋友送给我全新改版的《大秦帝国》。于是，我打开了久违的她。捧着厚厚的书，翻开每一页，咀嚼着每一行字，深深地感到，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所读到的最好的历史小说。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血腥最残酷的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张扬最奔放最具创造性的时期。这是各战国在“天下”这个舞台上定策谋国各展雄才充分竞争所演出的最壮丽的活剧。作者以生花妙笔全面地再现两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先祖们昂扬奋发生生不息不断开拓的生动画卷。

得相能开国

秦部族是从中国西部边鄙地区发展起来的，文化发展落后，民风质朴少文，孔子西巡不到秦，最初为中原地区各大小诸侯国所谓的礼仪之邦所轻，没有像齐国那样的稷下学宫之类的学府——人才汇聚。人才是富国强兵的第一资源，春秋战国之世，凡得一流人才治国理政的国家在短短的一二十年甚至数年大见成效。魏用李悝变法，使魏在战国初期盛极一时，称雄半个多世纪；燕昭王任用郭隗、剧辛、乐毅，几灭强齐，而剧辛、乐毅皆赵人；楚悼王任吴起为相，诸侯患楚强盛，吴起为卫国人。孝公以前的秦国不仅地处边远，土地没有开发，人才更是稀缺。“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这则求贤令，雪耻求治图强之情溢于言表，坦诚真切，胸襟阔大，千古雄文，至今读之，仍不禁为之拍案叹赏。秦国对于真正的人才，从来都不吝啬尊官显爵高位封土，从国君到朝廷到乡野百姓，都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敬爱山东士子。从孝公，到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直至秦始皇一直秉承这一国策。于是商鞅、甘茂、魏冉、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等开府丞相，还有秦国武将世家蒙骜、蒙武、蒙恬的先祖，还有工程巨匠李冰、郑国，纷纷从山东来到秦国，支撑秦国一百多年文治武功直到一统天下的烈烈伟业。这些人才不论是来自敌国友国大国小国，也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还是奴隶罪犯，也不论学派背景是法家儒家墨家计然家杂家，只要“出奇计强秦”，秦国都不拘一格，一律信而不疑，委以国政。反观山东六国，或有爱贤之名，表面崇尚学问，大造学宫，爱惜人才，礼敬名士，做的多是表面文章，特别是魏国，商鞅、张仪、范雎都与魏国失之交臂，这三位磐磐大才都是首先把魏国作为效力的首选之国，最后都被魏国的当政者赶到了秦国。而秦国在争夺人才的过程中，当政者所展示的爱才、惜才、信才、用才、护才的胸襟气度胆识为当时六国所不及，至今仍叹为观止。

长策归一统

古老的秦部族的最高首领中，一代一代地流传着一个秘语，那就是大出东方、一统天下。这就是秦国的基本国策，是秦国的最高政治目标。在秦国500多年的历史中，不管是地处西鄙边地，地促民穷国弱，还是六国联合分秦、合纵联军封秦，还是国势鼎盛势压六国，秦国没有因势弱而放弃，也没有因强势而懈怠，从来没有动摇这一信念，而且以此信念激励朝廷和国人，“纠纠老秦，共赴国难”，在艰难中坚持，在危困中奋起。一统天下，维护和平，造福人民，这种正统的思想根基一经种下，历数千年深深植根到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无论“天下”的范围扩展到什么空间，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维护统一维护和平造福人民的因子就播种到哪里。

秦国在坚持长策、走向一统天下的道路上，不会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势地灵活调整策略。在山东六国强大，特别是东出的拦路虎魏国在李悝、吴起变法后，吴起领兵占领河西，秦国国土萎缩，民生凋弊之时，秦孝公选择了韬光养晦，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奖励耕战，废除隶农，废井田开阡陌开发国土，厚培根基，时机成熟一战而收复河西。秦惠文王，针对秦国在与六国对抗过程中逐步取得均势的情况，起用张仪实施连横之策破苏秦的山东六国的合纵之策，不失时机地掠取西蜀，巩固地扩大了秦国的版图。昭襄王时，秦国与山东六国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秦则采取了分化瓦解，重点突破，消耗敌手实力的策略，长平之战灭赵40万生力军，震慑六国。到秦王嬴政上台，胜利的天平已完全倾向秦国。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以实力基础，秦国运用了人类历史上所发明的所有策略计谋，动用所有能动用的智慧和力量，打了两次规模超百万人的战争，还有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政治战、外交战、间谍战、经济战。在风云激荡全面对抗竞争中，那些睿智高远的至圣先贤、那些治国理政的圣君贤相、那些指挥若定的纠纠战将、那些融通天下的行商大贾，那些巧夺天工的能工巨匠，仍然像横亘天际的巨星，让我们今人仰望沉思。我们该从老秦人那里学些什么呢？

首先，更加全面地进行开放。500多年的秦帝国，向山东六国开放，向全天下开放，也向国内的人开放。因开放，秦国吸引了人才、物资、人口、思想知识智慧技术，因而创造了当时一流的政制（郡县制为构架的中央集权而不是分封贵族制）、一流的行政管理队伍、一流的军制和一流的作战部队、一流的国土开发（都江堰和郑国渠）、一流的经济和军备供应。

其次，坚持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改革就是利益调整。不进行利益调整的改革不能称之为改革。这很难但必须进行。大秦帝国为了秦国的强大能向全天下的人放权让利，给有才能的人高官厚禄直至出将入相，给普通隶农以土地和自由身份，给有耕战功劳的以高爵。而山东六国最高职位如丞相和上将军，为王族和其他世家大族把持，楚国是羋氏王族和昭、景、屈、黄四大家族，所谓战国四大公子无一例外都是王族，齐国是王室田族，韩赵魏亦是如此，而普通的国人和隶农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有所思

试验方法、科学态度与人文精神

——卢作孚创造性活力的源泉

□张守广

卢作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公认的“创业奇才”、“建设健将”，由其开创的北碚试验和由其创办的民生公司的业绩，已经广为人知。卢作孚极具开创性的人生，像传奇一样令人神往。何以卢作孚能够创造诸多辉煌的业绩？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本文认为：试验方法、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是三个关键因素。

1934年8月，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中，第一次把自己主持的各项主要事业称为创造现代社会生活的试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实验、邹平实验都曾经煊赫一时，但卢作孚有关“试验”的概念和方法却自有渊源。经过仔细考察我们能够发现：这是卢作孚将中国历史文化中注重“践行”的传统与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杜威实验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知道，蔡元培和黄炎培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蔡称为实利主义）的先驱。早在1912年和1913年，蔡元培和黄炎培就先后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等文章，“鼓吹此实用主义”。前者强调实利主义教育为“当务之急”，后者强调实用主义教育为“对病良药”，引起强烈反响和讨论。1914年，黄炎培又发表《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等文，进一步阐释和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恰在此时，青年卢作孚来到上海盘桓一年多，其间与黄炎培相识。受黄的影响，卢作孚萌发从事教育的想法并回川付诸行动。稍后，受业于杜威的陶行知于1917年留美归国，写下《试验主义之教学方法》等文章，着重介绍和强调杜威学说中的试验方法。杜威本人于1919年应邀来华访问、讲学，胡适和陶行知以其授业弟子身份，随行翻译并著文介绍，杜威学说风靡全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受此影响，卢作孚在从1922年到1948年的近20多年中，多次以杜威的教育学说为依据阐述自己的教育主张。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在介绍杜威学说时倾向于使用“试验”和“试验主义”，这与胡适倾向于使用“实验”和“实验主义”显然不同。尽管卢作孚与陶行知结识较晚，但显然主要是受到了陶行知的影响。从1922年初开始，卢作孚开始在教育问题上使用“试验”“试验方法”概念，从1923年开始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使用“试验”概念，并提出局部改造以规范全局的设想。1934年初，卢作孚与陶行知结识，此后联系越来越多。抗战时期，陶行知得卢氏兄弟帮助，迁居北碚并创办育才学校，联系更加紧密。总之，正是通过黄炎培、陶行知，卢作孚吸收了试验主义方法，并由此奠定了其致力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方法论基础。而这种方法论上的趋同与接近，也成为卢作孚与黄炎培、陶行知毕生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

科学在近代中国成为一面标识现代性的旗帜始自新文化运动，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卢作孚，自1923年起开始在著述中使用科学这一概念。随着各项事业的展开，卢作孚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越来越高，对科学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和全面，并逐渐形成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卢作孚指出：“科学就是整理经验的方法。”他还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的两个宝贝东西，“凡运用科学方法，加之于一种物质上，而使其有更好的结果，以供给人们享用的就是技术。至于把社会科学应用起来使两人以上的人群能够很好的共同工作，则为管理”。卢作孚认定：提倡和发展现代科技是提高人民生活、维护国家尊严的必由之路，必须致力于“以机器替代人力，以科学方法替代迷信与积习”。在北碚试验中，卢作孚把传播现代科技当成一项重要工作，他明确要求峡防局人员：“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到各市场或乡间。”为提倡科学和发展科学，他以民间的力量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不仅促进了四川及西南地区科技的长足进步及经济发展，而且为抗战爆发后内迁到后方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基本设施和栖身之所。1940年代初，卢作孚还以其诸兄弟私人捐款为主要资金来源，设立嘉陵文化基金会以提倡科学。卢作孚在《事由书》中写道：“吾国过去忽视科学，以致文化落后……值此国难严重，百物凋敝之秋，对于文化建设，亟应认定目标，先树基础，俾期逐渐发展，获得成效，以裨益国家，福利人民，进而探讨研究，日新月新，求与欧美文化并驾齐驱。”同时，卢作孚作为一个实业家，高度重视科学管理。他说：“工商管理所采用的方法系科学的方法。……管理亦系技术。”他要求公司人员：“报告数目字，尤须力求准确，不可马虎。”他强调事业必须先有精密的计划，而且计划的根据不能是想象的，应该“是根据从调查和研究得来的事实，又是从后来进行所得的结果证明相符的”。在民生公司试验中，他设计并推行了包括举行各种会议在内的一系列办法，以便于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他还将这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方法，整理成《工商管理》一书，产生很大的影响，时人把他与王云五一道，誉为“科学管理专家”。

卢作孚曾经说：集股创办公司一事，缘起于1925年他从成都回到合川后师友间的餐叙中。随后，召开筹备会募集股份，最初只有8000元，到上海订造一只小轮船和一些器材，民生公司便开张了。资金如此菲薄，公司初创时期的竭蹶状况不难想见。但各位同人聚集在卢作孚周围，同甘共苦，专注于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何北衡说：民生公司是民生朋友公司。正是卢作孚的人文精神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朝气蓬勃、服务社会、富强国家的社会经济力量。在经营上，卢作孚发现当时轮船公司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只图赚得到钱，毫未替顾客着想……要想营业发达，自然很难”。对此，他强调公司要服务社会，取得十分明显的结果。受到民生公司充满人文精神服务的顾客，总是赞不绝口，印象深刻。此类事例很多，如陈衡哲（任鸿隽的夫人、中国第一个女教授）于1935年12月从汉口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权轮到重庆，她后来在《独立评论》撰文写道：“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黄炎培于1936年初从上海乘民生公司轮船到四川考察，他在《蜀道》一书中深有感触地说：民生公司的好处，是能当客人“是个‘客’，是个‘人’”。民生公司是如此，北碚也是如此。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记述，抗战时期，后方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物价腾贵，公教人员生活困难，卢作孚指示北碚科学、文化事业单位，“以实物代工资”，舒缓了无数聚集在北碚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从黄炎培、叶圣陶、胡风、傅振伦等人的记述中，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在卢作孚所主持的事业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